

新經國風上卷

蓝菊荪译



I222.2/14

诗 经 国 风 今 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86620

886620

封面集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金成礼

封面设计：邹小工

诗经国风今译

蓝菊荪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20 插页 6 字数 368 千

1982年9月第一版

1982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4,500册

书号：10118·596

定价：2.3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原名《诗经国风研究（上卷）》，一九五八年作者曾用耕石书屋名义自费出版，但除私人馈赠前辈、友人、学术机构和国内各图书馆外，迄未公开发行。现经作者修订，交由我社重印。除原书“后记之后”改为“重印后记”外，其余一律用原纸型。原书所刊学界前辈对本书的题辞，则只选用郭沫若、叶圣陶二老的全文和顾颉刚先生的部分手迹。

萬分同意。

您的這件國風研究，我已讀過許多。您做了很好的一項工作，我定當贊成出版。

國風的翻譯，我生時也有過之，但為風心，并且也談過幾回，但終於沒有定案。上星期說成了這項建議，我的肩肘和手^腕都感到一種重擔。

郭沫若先生見解見仁，或許有誤，但這幾位先生跟大不相同，是有如雲的。前人有好的意見，加以吸收，可以逐漸完善。

從事生思把龍吟之可以研究也，那裏面更有好詩。

郭沫若先生引證高麗已脫稿等，以圖可以出版。

祝很多工作，早日出版。

郭沫若

壬午年三月十日

郭沫若題辭手迹

郭沫若题辞

菊荪同志：

您的「诗经国风研究」我已经拜读了。

您做了很好的一项工作，我完全赞成出版。

国风的翻译，我在前也存过这样的野心，并且也试译过几首，但终于没有完全。今天您完成了这项任务，我的肩头也好像卸下了一付重担。

细节处，见智见仁，或许有些不同，但提供出去让大家研究，是有好处的。别人有了好的意见，加以吸收，日后可以逐步琢磨。

我希望您把雅颂也加以研究吧。那里面也尽有好诗。

「楚辞九歌研究」既已脱稿，也可以同时出版。

祝您在工作获得丰收。

郭沫若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二日

菊孫為言嗜詩騷積歲研治不憚勞今
語遙澤國風遍遂以詩心費推敲我謂
君意良足慕書成自愜宜刊布涉此
途者又一家持與文苑增厥富

奉題詩經國風研究 一九六二年冬 葉聖陶

到今天我为顾先生引了《禹贡》以来的诗
 话，固然是上卷的出版，禹贡同治早先受
 了王序诗人的启发，先生修纂了《诗话》和
 音律世和五经性解，把诗话相为奇妙，他又
 是《楚辞》的古典，王序定为自己的《诗话》的
 人，单是诗话方面就都有过《古辞》和《楚
 辞》等文，王序为研究诗话的专家，他又这样
 地发表，先记诗话成果编为《王序》，供一般人的阅
 读，再把批判编为《王序》和《王序》的诗话，
 论拿王序，写成《王序》的著作，到王序中，
 诸读者进一步的指导，最后把《王序》的诗话过
 辑，编入《王序》的一个《王序》的著作，他
 以《王序》的《王序》为下卷，提供王序的诗话
 与评论，这是一个王序不高的著作，也是一个
 具有研究性的著作，王序和研究者的《王序》
 以，现在禹贡同治竟把《王序》的诗话一起编
 合在一册，用《王序》的诗话，王序多麼可惜！他
 不应当若王序家做一件王序在王序的著作
 生活中完成，不是禹贡的诗话。

顾颉刚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006718

目 录

关雎译注经过（代序）.....	3
周南.....	61
召南.....	85
邶风.....	115
鄘风.....	161
卫风.....	185
王风.....	211
郑风.....	237
齐风.....	281
魏风.....	305
唐风.....	321
秦风.....	349
陈风.....	373
桧风.....	397
曹风.....	407

豳风·····	419
周南注释（附录一）·····	443
葛覃译注经过（附录二）·····	499
诗经参考书目（附录三）·····	515
后记·····	625
重印后记·····	637

关雎譯註經過(代序)

——兼論風格形式和語言在譯詩中的重要性

“关雎”譯註总算完成了。现就(一)我是怎样去体会本篇主題的和(二)我是怎样去进行本篇譯註的，兩個問題來談談我的譯註經過。

(一)我是怎样去体会本篇主題的？

本篇“关雎”是“詩經”“国風”的首篇，那末，在体会本篇主題之前，对詩經国風、周南，也得有个概括的認識。詩經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詩歌总集，它的产生大約在周武王(公元前十一世紀)到周敬王(公元前五世紀)时候，即相当於西周初叶到春秋末季，当然更早的东西可能也有，这中間至少包括有六百年的光景，其間也正是農業生产已經發达的时候，因此詩經關於农事詩也保存得不少。詩經的体裁又分为“風”、“雅”、“頌”，这是按乐調性質来区分的。“風”就是各地方、各区域的民間歌謠，又称“国風”，詩經

上有所謂“十五國風”，即是十五個國家的民間歌謠。“南”大概是受了南方影響而另起的一種樂調。“周南”就是周公統治區域民間流行的歌謠，所以稱之曰“周南”。據說古時設有採詩之官，每年到民間去採詩，這傳說雖未必可靠，但現有的詩篇的確是經過一番整理加工的。舊說“孔子刪詩”，“我看不單純是孔子一人，那恐怕是經過先秦儒家不少次的刪改和琢磨。所以今天的詩篇，体裁也大体上一致，用韻也大体上一致。自漢以後，詩經被儒家尊為經典，兩千多年來，一直當作教科書一樣廣泛地在社會流傳着，是以中國文學史上沒有那一個詩人不曾受過詩經的影響。”由是統治者利用它來推行他們的所謂“詩教”，作為統治工具以後，在意義上也就充滿了各色各樣的歪曲和穿鑿，這給今天我們去體會詩經帶來了很多阻礙；但另一方面，詩經確實借此得以廣泛的流傳，後世的作家也的確從中吸受了它的精華，有些研究者的確在訓詁、解釋方面作了很多貢獻。歷代以來，關於詩經的註疏真是汗牛充棟，不過結論只有一條：就是如何用以鞏固封建統治，達到“詩教”為目的。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說：“詩經是不能夠予以全面信賴的，經過刪改的東西，必然要帶上刪改者的主觀意識和時代色彩，……其次解釋上的問題，這似乎可以說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但也並不是漫無標準。標準是什麼呢？就是咱們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據尽可能的資料，把當時社會性質弄清楚，一首詩才能夠得到正確的解

釋”。（奴隶制时代頁八七）所以我們去体会詩經，註疏自然有很多有問題，就是原文也有些不可靠，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考察当时社会性質、时代背景，去校正原文，參閱旧註，綜合地来分析研究，推敲琢磨。这样对原著的主題思想才可能得到比較正确的解釋。

本篇“关雎”就是这样，历来的註家們硬說“君子好逑”的“君子”系指周文王，“窈窕淑女”的“淑女”为文王后妃；又什么“貞靜純一，王教之端”，这当然是極端荒謬的說法，那末什么才是它的本来面目呢？这首詩时代虽然不能具体确定，自然大体是奴隶社会的产品（詳見郭先生奴隶制时代）；从地区來說，詩上提到河（在河之洲），这“河”在古代当系指“黄河”。再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諸句，我們又知道是一对青年男女相爱的詩歌，可以肯定。但这对青年男女是什么样的青年男女？問題就主要在“君子”、“淑女”、“鐘鼓”、“琴瑟”几个詞的解釋上。“君子”、“淑女”如为貴族青年男女的通称，“鐘鼓”、“琴瑟”又为貴族所專有，那末这对青年男女当系貴族無疑，因此李長之先生解为系“賀婚歌”虽未指明这首詩的主人公是什么样的人，大致肯定非劳动人民产品（李長之中国文学史稿頁二六）。陈子展先生則以为是“歌頌社会上層男女恋爱成功的詩歌”。詩序上又說过“乐得淑女，以配君子”，魯迅先生在“門外文談”一文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二句譯为“漂亮的好小姐呵，是少爷的好一对兒”，李、

陈二先生这样的解释，当然也似乎讲得过去，“君子”一詞在詩經上一般是貴族的通称，称反面人物；但也有作劳动人民的敬称，称正面人物的。如“君子于役”的“君子”，就是指那个出門当兵的男人——农村种地的男人。“淑女”，自然可以称貴族女子，但农村中勤劳的姑娘又何尝不可以称为“淑女”呢？詩經上一个詞的含义，本来就要看在什么具体环节下而定，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詩經上的名物，也有虚指、夸大，或用作比喻的例子。本篇的“琴瑟”、“鐘鼓”，就是用作比喻的，比喻这对青年男女感情融洽的幸福生活——自然这是当时广大人民的理想而已。魯迅先生的这两句譯詩目的在說明古代原始詩歌詞句比較簡單，並非專論詩經“关雎”的主題，再加以当时时代的局限性，如他生在今天，未尝不可以譯成“那个勤劳而美丽的姑娘啊，是好小子的好一对兒”的。詩經虽有所謂起兴的說法，但細味本篇詩中提到“雎鳩”、“河”、“洲”、“荇菜”等，当系实指，而引作譬喻的背景显然在农村，“君子”作为普通男子的尊称，是指那些幹活的能手，或純朴的青年，“淑女”作为农村中勤儉的姑娘去理解，純朴的青年和勤儉的姑娘結合，正是广大人民的理想和期望，以为可以得到幸福的生活，他們都为他倆的結婚而礼贊，那末，这篇主題就不是“歌頌上層社会男女恋爱成功的詩歌”。相反的倒是歌頌下層社会男女恋爱成功的詩歌，我主觀上觉得这样去理解比較更为符合当时的事实。詩經上的“君子”，余冠英先

生以为系貴族的通称，並不是表示德行，和后代用法不同，（文艺學習一九五五年七月号，關於詩經‘伐檀’篇和乐府‘孔雀东南飞’的一些問題）这种說法还是不够全面的，在詩經时代，“君子”自然是称一般貴族，称反面人物，如前所說。但称劳动人民，称人民理想中的人物，和作为普通男子的尊称，也並非完全沒有，“君子于役”的“君子”，就是尊称她那出門当兵的男人。也正如“士”在詩經时代，一般自然称士女，士大夫的貴族，但有时也为普通劳动男人的称谓。恐怕有人以为这“士”無論如何不是指劳动人民，魏風的“氓”不正是称那个男人为“氓”么？这“氓”就是当时的庄稼汉，甚或是生产奴隶，也即是那个負义忘信的男人。这确是事实，但要知道“氓”篇女主人公是遭受遺棄之后，憤怒發出的抗議，所以“賤称”直呼他为“氓”。譬如同篇的“士也罔極”的“士”也是說的那个“負义忘信”的男人。“士”一般是尊称男子，郑風的“溱洧”篇，“士与女”的“士”系尊称男子，“女曰雞鳴”篇的“士曰昧旦”的“士”，系尊称男子，我們能不能說在“氓”篇的“士也罔極”的“士”，也是尊称那个又賤称为“氓”的男子呢？显然不能的。这“士也罔極”的“士”就是称普通男人，而並非敬称、尊称。總之一句話，在詩經时代的称谓是沒有一成不变的，要看在什么具体环节下而定。有人說这还是不对的，我們应按照一般的通称。詩經时代，“君子”一般是通称貴族，这也是事实，“士”一般是尊称男子，尊称士大夫，这也是事实，我

們就得按照通例去理解，那么詩上特殊的例子如“君子于役”的“君子”，“士也罔極”的“士”有沒有？当然有。既然有，我們能說本篇“关雎”的“君子好逑”的“君子”，就一定是指貴族青年，而不是指出身农村的劳动青年么？显然也不能这样。如說本篇的“君子”是称出身农村的劳动青年，在产生了階級的階級社会下农村男人或生产奴隶能爱上貴族的千金小姐的“淑女”么？显然也不能这样。这“淑女”显然也是广大人民對於农村中勤勞的姑娘的尊称。至于“琴瑟”、“鐘鼓”如前所論是当时詩人用作比喻的，並非实指，並不是說这对青年自己享有“琴瑟”、“鐘鼓”，詩經上的名物本来就有用作比拟或夸大的，此处的“琴瑟”、“鐘鼓”就是用作比喻的明証。本篇背景在农村当無疑問，是歌颂青年男女恋爱成功的詩当無疑問，疑問的是这对青年男女是怎样的一对青年男女？据郭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当时富人还是住在城里，只有农人(大多数是生产奴隶)才是住在乡下，那么，这对青年男女的身份可以不言而喻了。詩經是經過文人刪改过的东西，冠在詩經之首的“关雎”能不能担保就沒有被人刪改？能不能担保一定就是本来面目？过去的御用学者把“君子”解作“周文王”，“淑女”解作“后妃”是为了宣傳統治階級的所謂“詩教”，当然是荒謬絕倫，那么解作“歌颂上層社会青年男女恋爱成功的詩歌”也与旧註似乎並沒有兩样，不过未指明是誰人吧了。这里我得加以声明，我並不是說我們今天去理解詩經每篇的主題与旧註

一定非有兩样不可，我並非說旧註完全要不得，旧註毫無可取，事实上过去的註家如王夫之、顧亭林、陈啓源、姚际恒諸人，对詩經的名物、訓詁都做了很大的貢獻，我們不能一概抹煞，相反的正是今天治詩經重要的文献，正值得批判的吸取呢。治中国古典文学，一定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去鑽研，去挖掘，务求得其本来面目，即所謂“实事求是”。既然我們把本篇的主人公的身份确定，我們再来看它产生的时代。本篇具体时代不可考，詩經产生在公元前五世紀到公元前十一世紀，正当西周初叶到春秋末季，当时是怎样的社会呢？郭沫若先生在这方面有精确的研究，他在“奴隶制时代”一文里說：

“所謂‘周有臣三千’是說周家这个奴隶主仅有三千名的奴隶而已。周人之所以能够克殷，大約是由於殷人在帝乙帝辛兩代是全力經營东南，流血过多，再者殷人嗜酒，生活恐怕也相当腐化了。周人严厉禁酒，特別是周公，他對於周人飲酒，是以死刑来处罰的。周人处在比較瘠瘠的西北，深知稼穡之艰难，故不肯輕易消耗粮食。有人以为周人克殷是由於農業生产的比較进步，在我看来倒是适得其反的。

“周人把殷复灭了，把殷族的遺民大批化为奴隶。左傳定公四年的一段文字是很重要的資料。‘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